

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

上海百货公司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编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F729
20
3

·上海史丛书·

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

上海百货公司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编著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1314108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B 543655

责任编辑 方小芬
封面设计 邹越非
版面设计 冯根寿

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

上海百货公司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编著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25 插页2 字数251000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200

ISBN 7-80515-161-X/F·56 定价 3.70 元

《上海史丛书》编委会名单

主编：张仲礼

编委：张仲礼 阮仁泽 唐振常 李华兴

李鸿江 丁日初 马伯煌 徐俊西

宋 军 肖志恬 段 镇 吴绍中

徐 阳

前 言

在60年代初，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会同市百货公司组织部分同志编写了《上海私营百货商业的发生、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初稿。当时是依据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及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共同拟定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改造研究工作五年规划（草案）”的要求，主要由市百货公司张逸义同志执笔。以后工作停顿，直至1979年党的三中全会后，始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会同市百货公司安排人员重写。

由于编写组原存行业史料已在十年动乱中荡然无存，这次重写必须重新搜集和查证史料，并对部分原工商业者进行访问核实。根据出版要求，对初稿篇章、结构、体例等作了较大改动，对行业沿革作了重点探索和考证，在内容史料上相应充实，关于行业改造一章则作了一些精简。本书对上海近代百货商业三大组成部分——环球百货业、华洋杂货批发业及小百货零售业分列专章撰写。全书共六章，原百货采购供应站宓震同志执笔编写第三章环球百货业，其余五章由上海百货公司法律顾问张志律师（市政府参事）执笔编写，最后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徐新吾修改定稿。上海百货公司经理金水、经理办公室主任万鸣华在出版等工作上给予关怀与支持！

在搜集资料过程中得到市档案馆、海关、市图书馆、藏书楼、市百十店、市工商联档案室及南市豫园商场政宣组等单位大力支持，提供史料；本所《上海对外贸易》编写组提供东洋庄有关百货贸易资料。在访问过程中得到黄日骞、巴凌云、朱企章、徐南

山及张和顺等同志热情帮助。金贤生同志协助编写环球百货业一章，在此一并致谢！

《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已列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编辑出版的《上海史丛书》之一，提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限于编者水平，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83年初二稿

1988年初修订

目 录

第一章 上海早期的百货商业·····	1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上海贸易史略·····	1
第二节 洋商侵占上海市场·····	4
一、 洋行纷纷设立 洋货源源输入·····	4
二、 洋行推销百货的经营方式·····	6
第三节 上海开埠后商业的发展和百货行业前身·····	8
一、 行业最早的前身——杂货店·····	9
二、 关于行业最早前身的其他来源·····	11
三、 行业的产生发展演变过程·····	13
第四节 早期的百货批发业务·····	22
第二章 小百货零售商业·····	26
第一节 小百货业发展过程梗概·····	29
一、 三十年代初以前百货业继续发展时期·····	30
二、 抗日战争前小百货业萧条时期·····	32
三、 抗日战争时期前一阶段小百货业的短暂“兴旺”·····	38
四、 抗日战争后期小百货业投机性的发展·····	40
五、 解放战争前期小百货业的曲折发展·····	44
六、 解放战争后期小百货业的衰落凋零·····	49
第二节 行业的业务经营和特点·····	51
一、 专业化的发展趋势·····	51
二、 综合性的发展趋势·····	52
三、 经营商品大类·····	53

四、	进货与销货·····	56
五、	资本与利润·····	59
六、	行业基本特点·····	71
第三节	国货日用品工业的发展及产品概况·····	72
一、	针棉织品·····	73
二、	化妆日用品·····	82
三、	搪瓷、钢精、热水瓶及玻璃器皿·····	88
四、	其他日用工业品·····	92
第三章	环球百货商业·····	99
第一节	大型百货公司的兴起和发展·····	99
一、	洋货的进口与上海洋商百货公司的出现·····	99
二、	华商百货公司的发生和发展·····	101
三、	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型百货公司·····	114
四、	解放战争时期的大型百货公司·····	121
第二节	大型百货公司的业务经营·····	126
一、	进货的渠道和特点·····	127
二、	销货的方式和方法·····	135
第三节	四大公司的同业竞争·····	141
一、	对外商百货公司的竞争·····	141
二、	对小百货业的竞争·····	143
三、	对国货商场与国货公司的竞争·····	145
四、	对专业性大型商店的竞争·····	146
五、	四大公司的相互剧烈竞争·····	148
第四节	资本与利润·····	150
一、	自有资本的积累和运用·····	150
二、	借入资本的来源和运用·····	163
三、	利润分配·····	169
第五节	大型百货公司的企业管理·····	174

一、	四大公司的组织管理·····	174
二、	国货公司的管理制度·····	178
第四章	华洋杂货批发商业·····	179
第一节	东洋庄与西洋庄·····	179
一、	沿革·····	179
二、	东洋庄经营梗概·····	180
三、	东洋庄的收歇和转业·····	191
四、	西洋庄经营梗概·····	197
五、	西洋庄的业务经营特点·····	203
第二节	华洋杂货业的形成和发展变化·····	205
一、	行业发展概况·····	205
二、	行业兴衰·····	219
第三节	华洋杂货业的业务经营·····	220
一、	同业经营洋货的背景·····	220
二、	经营范围和品种大类·····	225
三、	进货·····	231
四、	销货·····	236
五、	营业额及利润·····	240
第四节	华洋杂货业的基本特点和作用·····	243
第五章	百货行业的阶级关系及同业组织·····	251
第一节	工资、福利等规章制度·····	251
一、	基本工资·····	251
二、	变相工资·····	254
三、	学徒制度·····	257
四、	雇用职工·····	259
五、	行业《业规》和《店规》·····	261
第二节	职工组织及职工斗争·····	268
一、	工会组织活动·····	268

二、	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	269
第三节	同业组织及其内部矛盾·····	277
一、	组织爱起及早期活动·····	277
二、	汪伪统治时期的会务活动·····	280
三、	关于“商统会”和“百货业同业联合会”·····	283
四、	解放战争时期的会务活动·····	284
第六章	上海私营百货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288
第一节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限制和反限制斗争·····	288
一、	解放初期在物价波动中的上海百货市场·····	288
二、	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初步贯彻·····	289
第二节	行业发展的历史趋势·····	292
一、	小百货商业的基本概况·····	292
二、	环球百货商业的基本概况·····	295
三、	华洋杂货批发商业的基本概况·····	298
第三节	对批发商改造和对零售商公私合营·····	302
一、	私营华洋杂货批发商的改造·····	302
二、	私营百货零售商的安排和改造·····	306
三、	小商小贩的安排改造·····	314

第一章 上海早期的百货商业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上海贸易史略

我国的商业和商人资本活动历史悠久，早在秦汉以前已相当发展，在《春秋》及《左传》等史籍中都记载有巨商出现。从《史记》的《货殖列传》中亦可看出有关商人在关中、洛阳、三晋和山东等地经商的具体情况。但我国自周、秦、汉以来，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里自然经济占有极大优势，商品经济并不占有主要的地位，在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江南一带更臻繁盛。

上海地区的贸易起源，已难稽考。在对外贸易方面，据清同治《上海县志》记载，上海在宋时属秀州，隶两浙路，宋熙宁七年（1074年）设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说明当时已有一定数量的对外贸易。市舶司专置官员以主筦（联络）对外贸易，其职务为一方面“稽征番货”（管理外商船只货物税收），一方面“管理贡事”（管理外国贡使并保护、监督内外商民之交易）。元朝初年，政府倡行海运，而上海有水域之便，一度成为海运船只荟萃之处。明代上海一带时受倭寇骚扰，曾施行“海禁”，清初亦施“海禁”，闭关自守，上海对外贸易每况愈下。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废除海禁，翌年在上海设立“江海关”，专司海舶税钞。后因清政府又限外商只在广州一口与华人互市，上海对外贸易基本停顿。这时长江一带尚无西人足迹，在乾隆年间（1736～1795年）英人不断到上海一带调查，要求通商，为清政府拒绝。

在国内贸易方面，上海旧属松江府，棉区集中，棉纺织手工

业兴盛，自明清以来，土布和棉花的国内贸易相当发达，由于土布手工业的兴旺，还有土布制成日用品的商品，如据明范濂《云间据目抄》记载：“松江旧无暑袜店，暑间穿戴袜者甚众，万历以来，用尤墩布为单暑袜，极轻美，远方争来购之，故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①又如上海浦东地区盛产高丽布，旧时主要做面巾之用，亦远销南北各省。

但上海地区的内贸不只是松江的花、布业等与其他地区的粮食及手工业品的交换，上海地处南北海运中心，长江腹地广阔，并由于江南物产丰富，因而贸易发达，促进了商业资本的繁荣和沙船运输业兴起。据《上海古迹谈》关于“商船会馆”记载：“上海各种商业，当尚未辟租界通商以前，轮船尚未入口，以沙船为大宗，允称首屈一指，各商设立字号，如严同春、严大生、陈丰记、郭万丰、王信义等，每号多者有船三四十艘，少者二三十艘，其余亦有十余艘或数艘者，往来山东、牛庄、烟台、天津一带，获利甚巨……”。又据《古代上海述略》记载：“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作为沙船业行会组织的商船会馆，建立于上海县城东的马家厂，规模宏敞。……黄浦江中碇泊着有上海、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等地的沙船……”。当时“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百余号”。^②足见沙船贸易的繁盛。

在鸦片战争前，由于上海地区贸易的发达，早已形成“南北二市”，尤以南市兴旺。“在中外未通商以前，南市以豆业为领袖”，^③各业大小行号都萃聚其间。南市为早年上海的商业中心，这里的市场组织是往往一个行业集中在一条街，保留着不同程度的行会习惯。“至历史上原有地名现时仍为社会所通用者亦以城内及南市

①见明范濂著《云间据目抄》第2卷，第3页。

②见吴贵芳著《古代上海述略》第86页转引《皇朝经世文编》等记载。

③见《上海县续志》卷一。

一带为多。”^①在南市很早就有豆市街、菜市街、白衣街、花衣街、万竹街、篾竹街、竹行弄、筷竹弄、咸瓜街、火腿弄、药局弄、典当弄、洗帚弄、草鞋湾路、剪刀桥路、硝皮弄、铁锚弄及面筋弄等以行业命名的街道里弄，到现在有的路名还相袭沿用，这些地区都是各行业早期经营比较集中的所在，所谓“店多成市”。据说“南市各业交易，在昔均以上半日为限，至午后则无所事事矣！”^②南市沿黄浦滩一带，码头衔接，帆樯如林，米行木号多开设此处，即“里街亦市廛繁杂，居民栉比”。早年银钱业行号也大都开设于南市，这与南市当年商业兴盛有直接关系。

据《上海古迹谈》关于“潮州会馆”的记载：“潮州会馆……始于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在小东门外之洋行街……。”当时闽广船只集泊在南市大、小东门外，商务活跃，“港岸上也出现了为闽广商人经营的专门发售洋货的行号，这些行号集中的街道，就叫做洋行街……”^③。

北市早年以新闻沿吴淞江一带的市面较为兴盛。上海开埠后，北市建制包括租界区域，商业繁荣，上海港发展到鸦片战争的前夕，“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烦剧”。^④上海地区已成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清季末叶，人口迭有增加，五方杂处，万商云集，上海不仅为我国唯一大城市，而且也是世界名城。^⑤

①见《上海闲话》卷下，第3页。

②见《上海闲话》卷下，第2页。

③见吴贵芳著《古代上海述略》第87页。

④见嘉庆十九年（1814年）陈文述《上海县志·序》。

⑤上海人口，在开港以前不过七万五千人。开港以后，增加极速。民国十年（1921年）增加至一百一十万人，十九年（1930年）增至三百一十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人，为全世界十大都市之一。（见《中国实业志》（江苏省）1933年版，第三编，第31页。）

第二节 洋商侵占上海市场

一、洋行纷纷设立 洋货源源输入

上海在1843年开埠前，商业已渐趋繁荣，以后中外贸易中心渐由广州移至上海，从此上海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主要据点，除大批掠夺土特产出口外，大量进口洋货。洋商倚仗特权在上海纷纷开设进出口洋行。最早开设的是英商怡和洋行、仁记洋行等。据《洋务运动》(八)“上海杂记”记述：“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初开贸易，统中国内地仅有洋人462名，西妇幼孩甚少。宝顺、怡和、仁记、播威等行上海洋行之始”。到了1846年又有德商礼和洋行、禅臣洋行等开设，在1860~1893年间，上海洋行的设立象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后来兼营进口日用百货杂品的洋行，除了原有的怡和、仁记、礼和等外，尚有德商鲁麟洋行、孔士洋行、美最时洋行、顺金隆洋行、双龙洋行，英商泰隆洋行、宝顺洋行、森茂洋行、麦边洋行、祥茂洋行，美商科发大药房、茂生洋行等，法商康福洋行、永兴洋行、立兴洋行、笔喇洋行等，日商三菱洋行、三井洋行、大仓洋行等等约有三四十家之多。^①

洋行早期经营进口的业务，除鸦片外，主要是纱布，还有各种五金器材、颜料，以及各种日用百货和洋酒、食品等。洋行对日用百货的经营方面，各有主次，如德商礼和洋行以礼和洋针、链条牌木纱团、花边等杂货较多；英商洋行则着重于高档呢绒、布匹、棉毛织品为主；美商洋行以洋胰(肥皂)、洋油、洋烛等日用品较多；法商洋行则以巴黎香水、香粉、香皂等化妆品为多。总之，各国洋行是根据本国工业品生产特长，保持经营特色，在上

^①参见《中国经济年鉴》1935年版第十四章“商业”。

海推销商品，争夺市场。在1880年左右，洋货汹涌进口，日用百货不仅数量上逐年增加，而且花色品种也不断扩大，既有高档的奢侈消费品，又有一般的日用杂货，诸如洋针、洋纱、洋线、木纱团、毛巾、袜子、花边、洋油、洋皂、洋烛、洋火、洋灯、毛毯、绒毯、挂钟、座钟、呢绒、毛冷、棉布及香水等化妆品和搪瓷制品、玩具等等。仅以上海一地进口的日用杂货中的毛巾、袜子等数值的增加就是很惊人的，兹根据海关关册所载资料举例说明如下：

表1—1 1859~1894年上海手帕、洋针、袜子、毛巾进口数值统计表
进口值：海关两

年 份	手 帕		洋 针		袜 子		毛 巾	
	数 量 (打)	进口值	数 量 (千枚)	进口值	数量	进口值	数 量 (打)	进口值
1859	89913	68271						
1864	96166	76933						
1867			207294	53671				
1869	100148	60091	886845	230089				
1874	141247	39534	1330675	216030				
1879	354827	131162	892236	162059				
1882						2828		
1884	385964	157745	1711858	190868		1816		
1886						2168	197998	56753
1889	402407	161014	1873873	242375		4925	769389	22921
1891						16257	638301	191190
1893	551523	244092	2592104	382494		39557	883332	249646
1894	258051	118878	2421724	347963		25780	457174	147258

资料来源：根据海关资料整理。

根据上表的进口数量来看，手帕一项1893年较1859年增加五倍以上，洋针一项1867年到1894年的进口数量增加10.7倍，袜子进口值1894年较1882年增加八倍光景，毛巾在短短的八年中的进口数上升了一倍多。这几个数字反映当时上海市场对洋货日用品的需求情况已日益扩大，并且通过上海输送到全国各地的洋货数量亦在不断上升。

中国的手工业品在城市市场上是无法与进口同类机制品竞争的，有少数进口商品且已可深入农村。洋针是一项细小的商品，90年代初上海进口已达三十几万关两，土针不但是质量问题，在价格上无论如何也不能像洋针那样降低到每100枚售大洋二分五厘，^①因而不久洋针就广泛深入到农村。

英国驻华领事商务报告书第18页中曾提到“洋针(1869年)，针在进口杂货中是一项重要项目，并且是一项有显著发展的进口货，因此我认为值得特别提出。1868年进口值，较1867年实际增加二万二千两，这一非常事件，只能用下述事实来解释，即中国人已开始欣赏英国货了，他们认为英国货比他们所惯用的粗笨而昂贵的工具好了，中国针好像一段铁丝，针杆很粗，针尖很钝，针眼须一针一针地用手去钻。”

有的商品则主要是品质性能问题，如中国土制的高丽手巾在柔软与吸水方面远不及进口毛巾，洋皂的去污能力还远胜皂荚。有的则主要是使用方便，如洋火(火柴)首先逐步在城镇里代替打火石等等。总的说来洋货开始推销的主要市场还是在城市。

二、洋行推销百货的经营方式

^①“上海洋针每箱五十万枚，售价80至100海关两”。见《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177页。(按：海关两一两折合上海银两1.114两，上海银两折合大洋1.389元。洋针一箱以最低价80海关两计算，折合大洋只124元，100枚洋针售价大洋二分五厘。)

据访问业内人士提供资料，洋行早年推销日用杂货的方式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最初洋行雇人在热闹地区设摊出售商品，或者组织流动供应，串街走巷，甚至用免费分送用户等手段诱人使用。但主要手段还是利用我国买办商人，通过原有市场商业网点为洋货打开销路。开始时，洋行竭力培植洋货批发字号销售商品，交易非常迁就，洋行采用各种“优待”办法，例如对货款可开7~10天期票，对较大批发户还给以96~98折扣。为了能使批发商店有利可图，洋行在市场货价上涨时，按照商店以往销售能力，仍照原价派货一次；如遇货价下落，还可补偿差价。同时定货手续简单，商店只需选定品种、花色、数量，并在定单上签名或盖店章，甚至口头约定也同样有效。一般不付定洋，待货运到后商店只须先付清关税，即可在两个月内陆续出货，而出货时还可以开7~10天期票。洋行用这些方法来刺激商店经营洋货积极性，收到很大效果。所以到1880年以后，上海一些洋广杂货铺的大户，都积极扩大洋货经营，兼营洋货批发，于是洋行对本市一些小京货店，及小京广杂货店等的业务往来就逐渐转给洋广杂货铺承担。

外国资本主义在我国开设洋行初期，对中国商情不够了解，它们一方面既不信任中国的一般商人，而另一方面为了侵占我国市场，又急需通过原有商业网点倾销洋货，于是洋行积极利用买办商人作为对华经济侵略的得力助手。而买办商人为了扩大推销洋货，又雇用一批有业务经验的推销员向各洋广杂货等店联系业务推销洋货。而在洋货打开销路后，洋行原有的所谓“优待”办法就先后逐步予以取消。

我国买办商人的兴起是与洋货的推销有着密切关系，洋行最初的业务经营是出卖现货的，通过现货的推销或拍卖后，对利润好销路大的商品，下次到货时就要根据市场需要情况而决定，因此难免时断时续。也有货在途中，则由买办或推销员带样四出征求商店预购，以加速商品资金周转。以后也有接受商店定货代向